

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东西方灾难电影解读

以《日本沉没》和《末日崩塌》为例

杨黎¹

(1.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 长沙市, 410082)

摘要: 灾难电影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初, 70 年代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开始活跃于大荧幕。继美国好莱坞拍出多部经典灾难电影之后, 各国也陆续将富有本国特色的灾难电影搬上银屏。本文选取东西方各具有代表性的灾难电影《日本沉没》和《末日崩塌》作为主要比较对象, 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纬度视角出发, 分析《日本沉没》和《末日崩塌》等东西方灾难电影中所体现的文化现象, 探求其中蕴藏的文化差异及原因。

关键词: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灾难电影; 《末日崩塌》; 《日本沉没》

中图分类号: J9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人类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增强, 但另一方面, 火山、地震、海啸、洪水、不明病毒、天气异变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这些灾难面前, 人类以及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立即显得脆弱不堪。灾难电影就是人类对这一现状的思索和心理投射。在电影的历史长廊上, 曾经有不少经典的灾难片, 影片所描述的灾难场面及在灾难中凸显的人性本质总令人印象深刻, 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值得思索、探寻。

灾难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题材, 在带给人们美好的观影感受的同时, 也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将灾难片作为对象的研究也随着灾难片影响力的扩大也逐渐丰富起来。由于灾难片特殊的情节设定和前卫的主题构架, 大部分关于灾难片的研究都将关注点放在了叙事影像、拍摄手法、特效制作等上, 即便是对灾难片进行文化层面的思考, 也大多为探讨灾难意识或概述性地比较文化差异。试析灾难电影, 我们不难发现, 灾难电影独特的题材使本身便蕴藏着忧患意识, 救灾救人的情结设定使得影片中总不乏英雄人物, 而救灾主体也通常为政府、科学家、普通民众等。本文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出发, 旨在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探讨模式解读《日本沉没》与《末日崩塌》等较为典型的的东西方灾难电影。

1973 年小松佐京的小说《日本沉没》第一次被拍成电影便受到了日本民众的高度欢迎, 2006 年运用高新技术再一次将这部经典影片搬上大荧幕, 又取得超过 70 亿日元的超高票房, 该影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日本科学家田所博士通过监测, 发现日本附近海沟出现了异常活动, 经过系统分析, 得出日本列岛将会一年后完全沉没的结论。尽管消息传出招致多方质疑,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日本即将沉没的推断, 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 人们纷纷想方设法逃往国外, 首位首相在前往中国求助途中不幸遇难, 继任代理首相却弃国跑向美国避难。日本政府紧急采取海外移居政策转移国民、开辟救灾地。最后, 田所博士大胆策划, 采用钻井机将炸药灌入 4000 多米深的海底, 由消防员引爆, 炸断将日本岛拉向海底的板块, 从而阻止了灾难, 拯救了日本列岛。

美国灾难电影《末日崩塌》于 2015 年上半年开始全球发行, 横扫各国票房市场, 成绩斐然。影片的故事讲述了前美国大兵雷蒙德·盖恩斯在结束硝烟战火的生涯后, 成为了洛杉矶消防局的一名直升机救援人员。虽然工作中表现出色、受人尊敬, 但婚姻却已亮起红灯。某次和女儿短暂休假后, 雷重返岗位, 这时在内华达州南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 胡佛水坝在强震中被彻底摧毁。未过多时, 旧金山至洛杉矶一带也被强震袭击, 雷在直升机上亲睹了繁华城市转眼化为废墟的可怕一幕。此时他的妻子艾玛和女儿布蕾克均身陷险境, 为了拯救最爱的两个人, 他只身一人, 勇往直前, 与地震展开争分夺秒的赛跑, 最后救得妻女,

也挽回了濒临破碎的婚姻。

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一）提出过程

荷兰跨文化管理学者、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是当代跨文化管理和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之一，曾任职跨国公司IBM。他将社会学的分类法运用到文化研究中，以分布在全球40多个国家的11.6万名IBM员工为调查蓝本，以74个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民族价值观差异调查。根据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霍夫斯泰德从六个主要文化维度提出了民族文化的系统差异，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权利差距”、“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纵容/自制”，这也是人类文化研究史上首次将民族文化差异进行量化研究。

（二）内涵

根据《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中的阐释，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可做如下描述：“权利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等四个维度是关于四种领域的人类学问题（本论文只讨论这四种维度），包括社会成员对待权利分配的方式、对待不确定性事物的方式、个体与其所处的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或男性所具有的社会气质等方面，不同的国家民族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权利距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成员对权利分配的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在高权利差距的社会中，成员对于权利和财富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异有较高的认同度，而低权利距离社会的则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权利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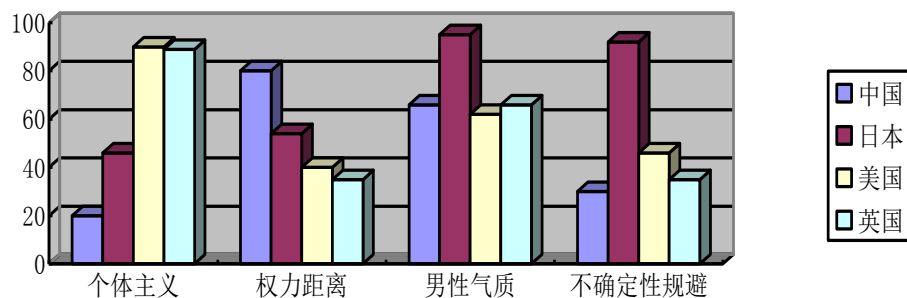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的是“个人角色和集体角色的取舍选择”。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重视个人的资源获得，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单独的个体属于群体，尽量维持群体的和谐及利益，强调忠诚度。个人主义指数越大，社会成员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指数越小，则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指的是“性别差异下社会的不同特点”。男性气质指数越大，社会男性化倾向越明显，在这种社会文化下，人们更崇尚竞争、权利等，男性的社会领导作用更强。而女性气质指数高的社会，男女性价值观相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差别不大，地位较为平等。

“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威胁和焦虑的程度”。在一个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文化中，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普遍较高，易忧虑，害怕不常见的风险，总是寻求如何降低事物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相反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比较低的文化中，社会成员则强调务实，焦虑水平相对较低，对模糊未知的情况或无序的状态的接受度更高。

二、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框架下的东西方灾难灾难电影解读

本文主要参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数值对比东西方灾难电影。为了让对比更加客观、立体，下图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型进行了整合，从中选取了美国、日本的文化维度数值，也选取了中国和英国的文化维度数值进行比较。从图一可以看出，东西方国家的文化数值差异明显，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作为两个较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的代表，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指数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图一.四国文化维度数值对比图

(一)个人主义指数

从图一可直观看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指数是91，排名为第一。在美国电影《末日崩塌》中，男主角沿袭好莱坞美式电影的一贯特点，单枪匹马、非凡超人，夸张地摆脱了各种超乎想象的险境，救得妻女，展示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英国的个人主义指数是89，排名第三，两项数值均与美国不相上下，同属于个人主义高的国家。英国经典灾难片《水啸雾都》，在伦敦全城陷入洪水恐慌之际，科学家莱纳德毅然选择只身潜水开启排水系统，留住了大坝也让伦敦幸免于这场浩劫，自己却因此牺牲。像这样的英雄形象也大比例的存在于英式的灾难片中。而日本的个人主义指数为46，中国则为20，二者都属于个人主义指数较低的国家，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在日本灾难片《末日崩塌》中，虽然也塑造了田所博士和消防员的英雄式角色，但更加突出的还是日本政府的救灾行动和日本民众在灭国灾难到来之际的惶恐和坚毅，更为强调集团主义。被称为我国首部灾难大片的《超强台风》则主要描述军民一心、齐心协力、抗灾救人的感人故事，突显以民为本，上下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

在西方灾难片中，无论是英式电影，还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一直将塑造传奇的英雄形象当做一大卖点，好莱坞电影的长盛不衰和这一点也不无关系。个人主义认为凭借智慧、能力、勇气，通过个人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就可以取得成功，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电影中的英雄因此成为美国普通民众精神上的寄托和实现不断追求的美国梦的代言人。因而在好莱坞的灾难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会有英雄挺身而出。^①

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作为资本主义运动大舞台的英国，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重视自我和个体的个人主义深入人心。而同样经过工业革命和独立战争洗礼的美国，个人主义也被称为美国精神的主要思想之一，并被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得极高的认同度，以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得到极力推崇。自然，在英美灾难片中，以大篇幅的镜头塑造英雄式的核心主角，都是个人主义在灾难片中的一种映射。

尤其在美国灾难片《末日崩塌》中，男主人公强森带着绝对的主角光环，情节设定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美国作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个人主义精神从早期殖民时期萌芽，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了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精神中，个人主义等同于其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美国的个人主义源自基督精神的理性原则及对自我的追求，它成了美国精神的起点和归宿，构成美国文化的精髓。

东西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大多数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与“集体主义”相悖的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国家大多崇尚集体主义精神。作为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自然条件下所孕育的大陆文化和稻作文化以及传统的儒家文化，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不断得以传承和发扬。而受这些文化的影响，集体主义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儿女的血液。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利益通常服务于集体主义，社会崇尚团结协作及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这在电影《超强台风》里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①郭继鹏，《好莱坞灾难电影中的美国文化解析》，电影文学，2015年13期，1页

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是集团意识,有着极其深厚的集体主义精神。公元前2-3世纪,先进的大陆文明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于是农耕文化开始在日本生根发芽。与中国一样同属于稻作文化圈的日本,集团主义也基于此慢慢得以形成。在日本高温多水的环境中,水田的开发、水利的维修管理、大面积的作物耕种收割,都需要很多人共同作业,于是开始形成了共同生活、劳动的集体村落。村落人强调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精神,逐步形成了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集团意识。这样的集团意识作为日本人高度认可的意识观念,还形成了以此为取向的社会伦理秩序,从而对每个日本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少有人敢向其提出挑战或提出质疑,和集团主义相背离的个人主义者往往会受到社会和团体的严重惩罚。这一点在“村八分”制度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所谓“村八分”意思是:村民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十项活动中,如果有八项准则不能遵守或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内所有人家都会与其绝交。作为日本人一旦遭受这种“村八分”,就意味着要和生活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断交,被整个集团孤立。受这样的集团意识的影响,即使在现代日本社会,团体意识对于个人主义仍然具有巨大的压力。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学者中根千枝,从社会人类学的立场上对日本社会进行分析,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基于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的欧美社会具有极大不同,日本社会强调“场”和“内外意识”,一旦属于某一个集团,便绝对忠诚于这个集团的利益。

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道:“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②神道教这一根植于日本土壤的本土宗教使日本人产生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现代社会,企业管理模式上也处处可见集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同,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这三种制度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三大法宝”。而这“三大法宝”也正是“集体主义”的经营思想的体现。“集体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企业是一个属于公司中每一个人的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普通员工还是决策者,任何个体的利益都屈从于集体利益。

(二) 权利距离指数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权利距离指数为54,中国则高达80;美国的权利距离指数是40,英国则为35。相对而言在这一项中,中国的数值最高,日本相对较高。中国灾难片《超强台风》也体现了这一点。影片中,一方面徐市长作为政府代表,遵从上级指示,主持救灾工作;另一方面,受灾群众在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地共度难关。同样,电影《日本沉没》中,鹰森面对迂腐自私的临时首相,无法在救国救难的危机关头,越权地做出利于国家的决策,只能屈服于权利。而《末日崩塌》中,淡化了权利阶级的设定,任何阶级的人都无法逃脱灾难。在灾难面前,男主角雷也暂时性的忽视了社会秩序,甚至随意抢夺交通工具和衣物。

儒家思想于汉朝之后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尊崇三纲五常。国君是臣民的纲,即臣民的主宰;同样,夫为妻纲,父为子纲。^③古代社会遵循固有的阶级秩序运作着,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小,权力分配固定化。儒家思想发展至今,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和发扬着这一传统思想。在走上共产主义的现代中国,儒家思想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主流地位。

日本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据《古事记》记载,公元5世纪初中国儒学思想传入日本,而后与佛教、神道教长期并存,互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造就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日本的等级制度不是行政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的身份,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日本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型,最高精神领袖为天皇,最底层为

^②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19页。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2015年,217页。

“贱民”。各阶层被固定地安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为维持这种‘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日本人生存的最高价值。

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在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事先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地位。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然后采取不同的交谈用语。而日语中也大量存在着适用于不同角色地位和场合的“谦语”“敬语”等，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也在这样的语言使用中得到了巩固和强化。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来区分交往时人的不同地位和身份。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使用“敬语”之外，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

而经历了独立战争，在《独立宣言》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美国，自建国起，就是一个排斥等级的社会。杰佛逊曾嘲笑欧洲的王公贵族，在美国甚至没有担任小镇镇长的资格和素养。十九世纪于法国也惊叹于美国人从政治文化到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美国人更加崇尚个人能力，而非权利。他们认为自身能力可以填满由权利和等级的差别而造就的鸿沟，能者即强者。自由与民主也是美国持之以恒的追求。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在权利分配方面提倡人人平等的思想。英国于 1689 年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对权利进行了重新分配，从而保障了普通资产阶级的利益，防止权利的过度集中。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三）男性气质指数

由图一的维度指数可以看出，美国的男性指数为 62，英国和中国均为 66，日本的男性指数为 92，四个国家均为男性指数相对较高的国家，尤其是日本。《末日崩塌》和《日本沉没》的主角都被设置为男性，在灾难面前，男主角都以独一无二、力挽狂澜的姿态，当仁不让地或救得妻女或救国救亡。

西方国家的女权意识觉醒相对较早。英、法等国随着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推进，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及政治条件。先进女性们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努力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在英国灾难片《水啸雾都》中，也刻画了水闸工程总监——萨米这一女性角色，在救灾过程中，也表现出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

美国是一个多国文化和人口混杂的西方国家，强调个人能力、崇尚竞争，然而美国现代社会中的男女性别差异并不算大，这得益于美国不断推进的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较为引人注目。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它经历了萌芽、繁荣、分裂、融合和起伏不定，为美国妇女争取到了许多与男性平等的权力。

美国的女性主义浪潮开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创造了适应其发展的气候和条件。这个时期，美国女性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权利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动力需求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女性的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很多女性在这个时候纷纷走出家庭的牢笼，投身于各行各业，并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独立意识不断觉醒，从而促使其探求人格完整并致力于女权运动。因此，在高等教育、法律、政府与女性文学作品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女性从此更有信心地在自由、平等、独立等权利层面上探求解放。到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女性不断地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和压迫，争取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解放。电影中，男主人公雷的女儿布蕾克在等待父亲救援时，也不畏险境，勇于自救，表现出不输男性的坚毅、果敢

自古以来，东方社会的男性气质突出，尤其是日本。日本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普遍鼓励、赞赏工作狂，人们崇尚用一决雌雄的方式来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信奉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应当快马加鞭，多出成果。“活着是为了工作”是许多日本人尊崇的生活信条。日本的女性地位也较男性低下，直至现在，仍有许多日本传统家庭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通常女性在婚后会辞去工作，在家做“全职太太”，专心照顾家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西

方女权文化的影响,现代日本女性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日本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趋势越发明显。而《日本沉没》作为一部拍摄于2006年的灾难片,也适时地体现了日本现代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在传统的日本电影中,日本女子通常被塑造为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女性形象,更多的展现出女性的传统美德。而在《日本沉没》中,女性形象不再只是爱情故事里的多情柔弱女主角,更多表现出女性刚强和极具韧性的一面,同时在角色的设定上,安排的玲子和鹰森实际也分别代表了两种阶层的女性。一种居于高位,直接统帅和领导,一种是普通的工作者。作为现代出入职场的女性工作者,玲子和鹰森都认真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本职工作,面对灾难表现出不输于男性的坚毅与果敢。这也说明电影的主创队伍在试图表达出对女性主义的呼吁和期许,同时也反映出女性社会地位较低的现状是客观存在和值得关注的。

(四) 不确定性规避

由图一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为46,英国为35,两国数值都不高;东方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普遍不高,中国为30,但日本却高达92。按照霍夫斯泰德的解释,美国、英国及中国属于对不确定因素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而日本则属于对不确定因素规避程度很高的文化。《日本沉没》中用大幅镜头展现日本人面对灭国之灾即将到来时的极度恐惧,日本政府在得知科学家田所博士预知日本将会沉没的消息后,表现出不信任并立即安排反复的实验测试,这与日本的特殊环境及民族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证明了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性。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一个位于地震带上的岛国,其国土面积较小,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极其有限,但人口密度却比较高。作为地震多发的国家来说,日本比一般国家更为痛恨地震、海啸等自然威胁,但又无能为力。虽然从地理角度来说,日本沉没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零概率事件,但一直深受地震和海啸等困扰的日本人却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甚至已经把这种意识埋进他们的民族特性中。因而,出于这种意识的体现,日本人创作并拍摄了日本电影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灾难片,即《日本沉没》,如此充满危机感的影片与日本发生过历史上毁灭性的震惊世界的阪神大地震和3·11大地震等不无关系。因而,这部影片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灾难片拍摄目的,它并不是通过灾难场景来刺激观众的神经,增加观感乐趣,以达到减压娱乐的效果。它把以往灾难片中作为附属要素的警示作用扩大化,强烈地折射出日本人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危机感,更像一场遍布全岛的全民灾难大演练。^④

而中国,悠久绵长的民族历史、辽阔的国土面积、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相对较好的地理环境等都造就了自信的大国思想。现实生活中,国民对于灭国之灾的发生不具备敏感性。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灾难片产量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

美国灾难电影《末日崩塌》及英国的《水啸雾都》等西方灾难片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也明显不如《日本沉没》,它们更多的是娱乐性地通过使用大量的灾难镜头来刺激观影者的感官。在西方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为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相对完备的社会设施、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体系、先进的教育模式等为国民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安逸的社会环境,因而表现出较低的不确定性规避。

总体而言,《日本沉没》、《末日崩塌》等东西方灾难电影中体现的文化元素是基本符合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这说明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出发对各国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有意义的,这也为研究不同国家的电影文化提供了新的有力途径。

参考文献:

- [1]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14)

^④钱燕青,《从灾难片《日本沉没》谈日本人的忧患意识》,电影文学,2012年第9期,(1)

- [2] 笈泰彦（日本）：《日语与日本人的发想》[M]，日本教文社，1974年（23-27）
- [3] 川岛武宜（日本）：《日本社会家族的构成》[M]，日本评论社，1950年
- [4] 中根千枝（日本）：《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M]，讲谈社，1967年
-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三联书店，2015年（217）
- [6] 太安万侶（日本）：《古事记》[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年
- [7] 林立树：《美国文化史》[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 [8] 解斌、秦彤：《美国灾难电影的价值观转移》[J]，电影文学，2015（1-3）
- [9] 宋海瑛：《美国灾难电影建构模型分析》[J]，电影文学，2012（01）
- [10] 郭继鹏：《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文化解析》[J]，电影文学，2015（13）
- [11] 徐建刚：《美国电影中的文化透视》[J]，电影评介，2008（07）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Disaster Movie based on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A Case study of The Sinking of Japan and San Andreas

Yang Li¹

(Hun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Disaster movie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t has been active in the big screen as a new art form in the 70s. Following the classic Hollywood disaster movies,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o present their own distinctive disaster movies onto the screen. This paper selects a representative disaster movie Sinking of Japan and San Andreas of the East and West respectively as the main comparison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titude of Hofstede, the author analyzes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explor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reasons which embedded in Sinking of Japan and San Andreas and other East or West disaster movies.

Key-words: Cultural latitude of Hofstede; Disaster movie; San Andrea; Sinking of Japan